

周 勇,王蒙恩. 城中村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以西安曲江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2):289-294.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12.071

城中村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 ——以西安曲江为例

周 勇,王蒙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55)

摘要:现有的社区评价体系并不适合对城中村安置社区进行评价。根据当地风土人情、管理体制等特点选取了 34 个评价指标,通过专家咨询指标进行筛选和分类,进而建立了城中村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体系。选取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安置社区为研究对象,在模糊综合评价中引入偏向度对安置社区宜居性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城中村;评价体系;安置社区;宜居性;偏向度

中图分类号: TU984.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7)12-0289-05

城中村是指伴随城市郊区化、产业分散化及乡村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为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城建用地范围的原有农村聚落,是乡村-城市转型不完全、具有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域实体^[1]。西安市于 2007 年全面进行城中村改造工作,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已实施 189 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 9.12 万户、31.53 万人口。目前已有 127 个城中村 6.78 万户、23.61 万人完成了回迁安置。因此,城中村安置任务不仅是原住居民融入城市生活的基础,也是当前城镇化的关键一步。

1 研究综述

1.1 城中村研究

城中村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且卓有成效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结为 4 个方面:城中村成因、改造模式、失地农民以及其他方面。大多数的学者从制度及利益驱动等角度来解释城中村形成的原因。房庆方等将城中村的产生归结为土地、经济、政策这 3 个原因^[2]。吕宏芬等认为二元土地管理制度是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则是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3]。

在对城中村改造模式的研究中,王涛等分析各种已有的改造模式优劣、特点及可行性,提出相关对策及建议,对将要进行大量城中村开发改造的城市具有一定借鉴作用^[4-6]。

失地农民是城中村改造中被社会广泛聚焦的问题。汪晖从征地补偿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现有的农地征用制度必须进行改变并可分为 2 个阶段进行改革^[7]。刘源超等研究了社会资本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影响^[8]。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计划(编号:2013-R4-9);西安碑林区科技计划;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陕西省房地产技术经济及管理研究项目(编号:E08005)。

作者简介:周 勇(1969—),女,陕西西安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E-mail:783195327@qq.com。

通信作者:王蒙恩,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E-mail:798884235@qq.com。

对于城中村问题,学者们也从人口及空间视角进行了多个角度的研究。全德等以深圳 91 个城中村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空间形态演化模式和形成原因^[9]。丁传标等运用空间句法,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探究村落空间形态与居民居住安全感之间的关系^[10]。

1.2 宜居性研究

“宜居”的概念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念。国外对“宜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宜居性。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学者 Robert 等的研究对宜居城市建设理念产生了直接影响^[11]。1996 年在土耳其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届人类环境大会中,明确地提出了城市的宜居性概念。Berg 认为宜居性的核心思想就是重新塑造城市环境;在城市形态上,要建设适合行人的道路和街区,恢复过去的城市肌理;在城市功能上,强调城市的工作、居住、零售等综合职能,增强城市的多样性,使其变得更适宜一般市民居住^[12]。Evans 认为宜居性有两面,一面是适宜居住性,一面是生态可持续性^[13]。国外在社区宜居性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是社区的规划思想和评价体系,其中以“西雅图可持续社区指标(Indicator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1998”、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规划思想为代表。

国内关于“宜居”的研究主要起始于吴良镛的人居环境,且近年来国内研究多见于“宜居城市”方面,而将“宜居”延伸至社区层次的研究较少。李丽萍等界定了宜居城市的概念,并提出宜居城市的七大判别标准^[14]。张文忠从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舒适性等 5 个方面,构建了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15]。任学慧等采用层次分析法和 Q 型聚类分析方法,从行政区和不同功能片区 2 个角度,进行了大连市居住适宜性空间评价^[16]。在社区宜居性研究上,闵雷等以武汉低碳生态社区为例进行了宜居型社区规划^[17]。郑童等对社区宜居性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18-20]。

1.3 评述

目前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多集中于城中村成因、改造模式、失地农民、城中村外来人口等方面,鲜有对城中村安置社

区宜居性的评价研究。此外,现有社区宜居性评价焦点多侧重于安全、环境、经济、配套设施等物质空间层面,也有部分学者从社会性、地域性等方面进行研究。但由于城中村居民安置中所涉及的风俗习惯、地域文化、社会关系纽带、基层群众自治等特点,照搬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安置社区宜居性进行评价并不合理。因此,本研究根据以上 2 点并通过对陕西省西安市已完成回迁工作的安置社区进行问卷调查后确立了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西安市 6 个安置社区为例,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并引入偏好度对安置社区宜居性进行评价,验证评价体系的合理性。

2 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研究通过以下 2 个步骤确定指标体系。

2.1 实地调查

通过走访、邮件发放等方式对西安市雁塔区、碑林区、莲湖区 15 个城中村安置社区进行影响宜居性因素调查,共发放纸质和电子问卷 810 份,有效回收 681 份,有效率为 84.07%。调查对象性别女性占 54.63%,男性 45.37%;样本年龄段以≥35 岁为主,约占 74.45%。将获取的信息归纳总结编制成表 1。这也是本研究构建指标体系的重要参考。

表 1 宜居性重要因素调查结果

重要因素	提及的次数 (≥50)	重要因素	提及的次数 (≥50)
房屋质量	569	收入	392
安全	478	医疗	371
周边学校	436	景观绿化	289
民俗活动	317	噪音	237
居民就业	383	商铺分红	210
商业购物	305	居委会管理	132
休闲娱乐设施	344	社区活动	106
环境卫生	352	夜间照明	52
物业管理	218	农贸市场	89
出行交通	512	车位	64

2.2 确定评价指标集

采用文献分析法参考国内外宜居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实地走访、安置社区实际情况和特点,并对含义重叠的指标进行了合并或者删除后确定预选指标集: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市政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活动设施、商业服务设施、邻里关系、环境健康、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基尼系数、文化水平、教育观念、周边噪音、开敞空间、建筑质量、人均住房面积、容积率、建筑整体外观、城市公共活动参与度、安全性、就业情况、内部生活便利度、传统习俗的延续、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基层管理、社区管理、户型设计、社区福利、绿地率、建筑密度、老字号店铺、社区文化活动、社区位置。根据预选指标集编制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调查表,通过现场访问、邮件等方式发给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当地社区代表。调查问卷共计 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28 份,回收率 85.33%。在回收的问卷中,高校教授占 35.94%,科研院所专家占 28.60%,企业工程师占 15.63%,社区代表占 19.53%。通过对问卷结果的分析,最终确定了城中村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市政设施、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活动实施、商业服务

设施、邻里关系、环境健康、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文化教育、开敞空间、建筑质量、容积率、城市公共活动参与度、安全性、就业情况、内部生活便利度、传统习俗的延续、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基层管理、社区管理、户型设计、建筑密度。

2.3 个别指标说明

由于大量文献已经对部分指标进行了释义,因而本研究只对具有城中村安置社区特点的指标进行说明。基层管理指的是居委会(原村委会)制定和监督执行村规民约,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管理集体资产。物业管理主要是由社区居民成立管理组织对社区进行管理,管理人员基本以社区居民为主。内部生活便利度是指社区居民的生活问题依靠社区内部条件可以解决的程度。居民收入包括工资收入、租金收入和集体分红。文化教育包含有社区居民受教育的水平和对下一代应该如何教育的观念。城市公共活动参与度是指居委会或者政府组织的公共演出、选举、听证会、慈善募捐等社会公共活动居民的参与情况。传统习俗的延续是指当地居民在拆迁安置后仍然保留传统习俗的行为习惯。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是指在拆迁过程中保留对当地居民具有重要意义的场所和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历史古迹,如北池头的古槐、曲江池的寒窑、木塔寨的双塔遗址、石家街的元代安西王府遗址等。

根据指标含义,将 24 个指标进行分类,安全性、环境健康、建筑质量等 8 个指标归为一类,命名为居住环境;教育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 6 个指标归为一类,命名为配套设施;就业情况、文化教育等 5 个指标归为城市融入;基层管理、物业管理、内部生活便利度为一类,命名为社区管理;传统习俗的延续、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归为一类,命名为历史场所和传统文化的延续(表 2)。

2.4 指标权重的确定和评价方法的选择

(1)AHP 方法确定权重。通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规划院、陕西天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的 15 位学者专家对指标重要性进行打分来构造两两比较矩阵,利用 AHP 软件求出该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的特征向量,并经归一化和一致性检验,进而得出指标权重(表 2)。

(2)评价方法的选择。考虑到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因而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评价。

3 案例分析

3.1 社区概况

选取西安市曲江新区的 6 个“城中村”安置社区(图 1)为研究对象。社区人口主要以原居民为主,在有效问卷中约占 78.3%,相比之前“城中村”时期,人口流动性大大下降,成分较为单一。文化教育上,中老年人(≥44 岁)文化层次普遍较低,大部分为小学文化,而 18~35 岁年龄阶段的人群以初高中及中专为主,约占调查主体的 63.7%,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基本在 30 岁以下,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约 8.1%。

3.2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本次调查问卷发放区域为北池头、南窑新家园、后村、芙蓉、曲江池、雁鸣 6 个安置社区,并对性别、年龄进行交叉配额控制,共发放问卷 900 份,回收 772 份,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发现存在部分无效问卷。无效问卷指的是答案大部分相

表 2 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以及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居住环境(0.416)	安全性	0.067
	环境健康	0.062
	建筑密度	0.034
	邻里关系	0.036
	容积率	0.043
	开敞空间	0.028
	户型设计	0.039
	建筑质量	0.107
配套设施(0.253)	教育设施	0.061
	市政设施	0.042
	公共活动设施	0.044
	公共交通设施	0.022
	医疗设施	0.053
	商业服务设施	0.031
	就业情况	0.042
	居民收入	0.053
城市融入(0.175)	居民消费	0.031
	社会公共活动参与度	0.022
	文化教育	0.027
	基层管理	0.024
	物业管理	0.047
	内部生活便利度	0.028
	传统习俗的延续	0.035
	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	0.023
社区管理(0.099)		
历史场所和传统文化的延续(0.058)		

同或答案呈现一定规律等的问卷,将此类问卷剔除,最终得到有效问卷为 733 份,有效问卷率为 81.44%,其中北池头为 131 份,南窑头为 118 份,后村为 116 份,芙蓉小区 114 份,曲江池为 125 份,雁鸣小区为 129 份。调查对象性别中,男性占 52.35%,女性占 47.65%。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分布在 26~35 岁和 38~52 岁,占总人数的 69.2%。调查问卷采用五分制打分,其中评价结果差区间为(0,1],较差为(1,2],一般为(2,3],较好为(3,4],好为(4,5]。结果见表 5,() 内为问卷数量。

3.3 社区宜居性评价

根据所确定指标,确定评价对象集 $U = [\text{安全性}(u_1), \text{环境健康}(u_2), \dots, \text{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u_{24})]$,评语集 $V = [\text{差}(v_1), \text{较差}(v_2), \text{一般}(v_3), \text{较好}(v_4), \text{好}(v_5)]$ 。从评价对象集到评语集建立模糊关系,算出各指标的隶属度。根据二级指标的得分先求出北池头社区指标隶属度(表 3)。

所有的评价指标的权重在 U 上构成模糊向量 $R = [0.057, \dots, 0.034]$ 。利用式(1)计算因子的评价矩阵 A ,其中的 5 个数值表示宜居性对该评价等级的隶属度。

$$A = R \times C; \quad (1)$$

$$G = D_{45}/D_{12}。 \quad (2)$$

其中, C 为社区评价指标隶属度矩阵; G 为宜居性偏向度,表示社区宜居程度, $G > 1$ 表示宜居性较好,反之则差; D_{45} 为评价结果等级较好与好的总和, D_{12} 为评价结果差与较差的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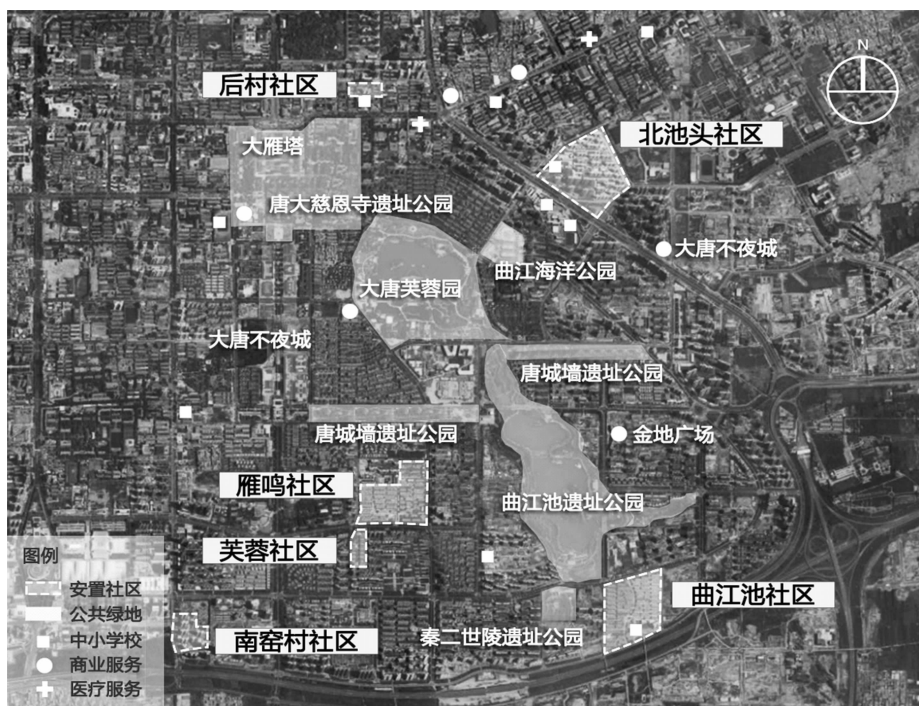


图1 安置社区概况

和。利用式(2)分别计算北池头社区 A_1 的居住环境等因子和整体评价,结果见表 4。

按照上述过程,计算其余 5 个安置社区的宜居性偏好,结果见表 5。表中编号 1 代表北池头社区,编号 2 代表南窑新家园社区,编号 3 代表后村社区,编号 4 代表芙蓉社区,编号 5 代表曲江池社区,编号 6 代表雁鸣社区。

由表 5 可知,南窑新家园、后村社区整体宜居性较好 ($G > 1$),其余 4 个社区宜居性较差 ($G < 1$)。

在居住居住环境方面,6 个社区的评价均偏向差。居住环境下属指标中,安全性、开敞空间、户型设计、建筑质量的评价均偏向差;而建筑密度、容积率、邻里关系的评价均偏向好。北池头、后村、南窑新家园社区的环境健康的评价偏向差,其

表 3 北池头社区评价指标隶属度

二级指标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G
安全性	0.160(21)	0.351(46)	0.290(38)	0.130(17)	0.069(9)	0.389
环境健康	0.183(24)	0.405(53)	0.290(38)	0.049(6)	0.076(10)	0.213
建筑密度	0.023(3)	0.115(15)	0.221(29)	0.466(61)	0.176(23)	4.652
邻里关系	0.038(5)	0.076(10)	0.260(34)	0.504(66)	0.122(16)	5.491
容积率	0.008(1)	0.061(8)	0.300(39)	0.473(62)	0.160(21)	9.174
开敞空间	0.214(28)	0.359(47)	0.267(35)	0.107(14)	0.053(7)	0.2792
户型设计	0.107(14)	0.282(37)	0.366(48)	0.168(22)	0.076(10)	0.627
建筑质量	0.290(38)	0.420(55)	0.168(22)	0.084(11)	0.038(5)	0.172
教育设施	0.084(11)	0.176(23)	0.305(40)	0.275(36)	0.160(21)	1.673
市政设施	0.031(4)	0.183(24)	0.282(37)	0.344(45)	0.160(21)	2.355
公共活动设施	0.092(12)	0.084(11)	0.397(52)	0.282(37)	0.145(19)	2.426
公共交通设施	0.023(3)	0.115(15)	0.221(29)	0.443(58)	0.198(26)	4.645
医疗设施	0.053(7)	0.145(19)	0.252(33)	0.305(40)	0.244(32)	2.773
商业服务设施	0.015(2)	0.130(17)	0.336(44)	0.466(61)	0.053(7)	3.572
就业情况	0.183(24)	0.282(37)	0.267(35)	0.107(14)	0.160(21)	0.574
居民收入	0.176(23)	0.282(37)	0.344(45)	0.115(15)	0.084(11)	0.434
居民消费	0.153(20)	0.198(26)	0.313(41)	0.198(26)	0.137(18)	0.954
社会公共活动参与度	0.160(21)	0.305(40)	0.176(23)	0.229(30)	0.130(17)	0.772
文化教育	0.061(8)	0.099(13)	0.313(41)	0.420(55)	0.107(14)	3.294
基层管理	0.191(25)	0.237(31)	0.351(46)	0.107(14)	0.115(15)	0.519
物业管理	0.137(18)	0.191(25)	0.305(40)	0.260(34)	0.107(14)	1.119
内部生活便利度	0(0)	0.023(3)	0.214(28)	0.542(71)	0.221(29)	33.174
传统习俗的延续	0.282(37)	0.366(48)	0.221(29)	0.084(11)	0.046(6)	0.201
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	0.328(43)	0.420(55)	0.137(18)	0.061(8)	0.053(7)	0.152

表 4 北池头社区评价结果

因子	等级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G
居住环境	0.058	0.111	0.101	0.084	0.034	0.698
配套设施	0.013	0.035	0.074	0.084	0.04	2.583
城市融入	0.027	0.042	0.051	0.035	0.022	0.826
社区管理	0.013	0.018	0.034	0.035	0.017	1.677
历史场所和传统文化的延续	0.022	0.029	0.013	0.005	0.004	0.176
总和	0.133	0.235	0.273	0.243	0.117	0.978

余社区偏向好。

配套设施方面,6 个社区的评价等级均偏向好。南窑新家园、芙蓉社区、雁鸣社区的公共交通设施、教育设施、医疗设施的评价偏向差,其余社区偏向好。安置社区在公共活动设施、市政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方面的评价均偏向好。

城市融入方面,除北池头、曲江池社区的评价偏向差之外,其余偏向好。文化教育的评价均偏向好。就业情况、居民消费、社会公共活动参与度的评价偏向差。对于就业情况,6 个社区的评价均偏向差。南窑新家园、后村社区的居民收入评价偏向好,其余社区为差。

安置社区对社区管理的评价偏向好。南窑村、后村社区基层管理的评价偏向好,其余评价偏向差。物业管理、内部生活便利度评价均偏向好。

历史场所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情况不太乐观,评价均偏向差。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可能与拆迁、重建中缺乏合理的规划有关。安置社区在传统习俗的延续评价均偏向差。除曲江池社区在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评价偏向好之外,其余社区评价均偏向差。

4 改善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果可知,安置社区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通过研究结论,结合当地安置社区具体情况,对提高社区宜居性提出以下建议。

4.1 物质空间层面对策

进行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注重与城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对接,使居民们通过充足的购物、社区服务、医疗服务、娱乐及休闲设施等社会保障设施,在重安置社区中找到归属感,积极有效融入城市生活;合理设置公共服务设施的位置,针对目前不合理的状况进行搬迁、改造;同时,加强后期管理、维修工作,保证各项服务设施的正常运营。

社区内应有效增加绿地及公共空间的数量,形成体系完善、空间序列明确的绿地及公共空间,以满足安置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需求;提升空间设计水平,将安置居民的生活习惯、心理需求及原本的历史文化脉络在景观设计中加以考虑。如在绿地空间设计时,对现状居民将绿地改为菜园的行为加以考虑,在设计中预留一些能够满足居民此类自发行为的小

表 5 安置社区宜居性偏向度结果

评价指标	G1	G2	G3	G4	G5	G6
安全性	0.389	0.741	0.809	0.512	0.447	0.480
环境健康	0.213	0.445	0.622	2.392	1.799	1.918
建筑密度	4.652	3.473	1.396	3.724	4.003	3.308
邻里关系	5.491	4.927	3.802	5.282	4.621	5.249
容积率	9.174	6.230	3.783	7.961	6.788	8.579
开敞空间	0.279	0.740	0.539	0.412	0.866	0.925
户型设计	0.627	0.865	0.941	0.908	0.597	0.717
建筑质量	0.172	0.578	0.629	0.590	0.681	0.911
教育设施	1.673	0.731	3.993	0.825	1.181	0.920
市政设施	2.355	1.953	3.311	2.834	3.037	2.859
公共活动设施	2.426	1.946	1.225	2.048	3.181	2.767
公共交通设施	4.645	0.962	6.752	0.738	2.901	0.846
医疗设施	2.773	0.711	4.792	0.739	1.873	0.971
商业服务设施	3.572	3.089	4.677	2.116	3.054	2.962
就业情况	0.574	0.910	0.954	0.413	0.709	0.818
居民收入	0.434	1.749	2.158	0.379	0.533	0.728
居民消费	0.954	0.883	0.915	0.753	0.802	0.847
社会公共活动参与度	0.772	0.831	0.701	0.619	0.904	0.875
文化教育	3.294	2.757	3.081	2.211	2.599	2.838
基层管理	0.519	1.689	2.080	0.755	0.611	0.800
物业管理	1.119	1.716	1.933	2.164	2.038	1.473
内部生活便利度	33.174	18.192	28.503	4.764	15.044	23.754
传统习俗的延续	0.201	0.483	0.774	0.810	0.893	0.524
历史文化场所的保留	0.152	0.359	0.527	0.710	2.479	0.682
居住环境	0.632	0.537	0.496	0.542	0.611	0.584
配套设施	2.471	1.439	3.075	2.127	2.391	2.983
城市融入	0.783	1.253	1.074	1.236	0.949	1.135
社区管理	1.692	1.731	1.956	1.062	1.384	1.423
历史场所和传统文化的延续	0.175	0.858	0.679	0.751	0.251	0.388
整体	0.936	1.419	1.804	0.811	0.762	0.842

型蔬果园地,设置一些满足传统生活操作的晾晒台等。

协调各方利益,加强监管力度,适当提高回迁安置房建设成本,使其居住品质有所保障;设计手法上,应灵活寻求经济、实用且效果美观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方式;住宅布局上应注重空间变化,形成社区一组团一邻里的层次分明的布局方式;户型设计上,应考虑回迁居民的特殊生活方式,实现户型的多样性和可变性。

4.2 社会生活层面对策

在现有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物业管理,为村民在社区内部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方便群众生活;在今后居民回迁过程中政府和村委会要合理有序地引导内部商业服务的发展,在方便居民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构建起和谐规范的社区生活。

构建和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展就业培训教育、就业指导和就业心理咨询,使得安置社区居民有一技之长并能较快适应城市的工作生活,帮助并指导居民进行创业;合理出租并良好经营集体商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规范使用集体财产为民造福。鼓励个人或者机构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区、社会活动,利用现代化媒体网络进行公共活动信息互动,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的热情,并给予适当的经济文化支持。

传统民俗起源于人们自身的生活需求,在各民族、各地域中随着时间不断扩大和演变。它们的存在不断丰富人们的

日常生活,也增强了集体凝聚力。政府需要在农村传统习俗的传承中要加强引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不断适应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通过加大对传统民俗这些非物质文化的宣传力度,编纂村志等措施,既能保留、延续村落文化,又能凝聚居民,满足他们难以割舍的乡土情节。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原居民熟悉的历史场所和标志性节点,如一些历史建筑、古树、古井等,将其融入公共空间设计,以增强地域特色,并正确引导居民使用这些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的场所。全面普查“城中村”的历史文物,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并由当地文物保护单位与村委会进行管理和维护。

城中村改造不仅仅只有“拆”与“建”,还有居民的回迁安置、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本研究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了解安置社区的情况,构建安置社区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指标体系对西安市曲江新区安置区宜居性进行评价,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应的建议,希望能为今后城中村改造及安置社区规划建设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邵 峰.城中村家庭结构变化对失地农民居住和养老模式的影响——以青岛城中村为例[J].经济纵横,2008(7):119-121.
[2]房庆方,马向明,宋劲松.城中村:从广东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遇

任超,谢小芹. 发展型治理——东部沿海村新型治理机制[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2):294-298.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12.072

发展型治理——东部沿海村新型治理机制

任超^{1,2}, 谢小芹³

(1.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研中心, 北京 10010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3.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摘要: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庄治理兼顾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特性和以秩序维持为核心的治理特性,本研究将这种治理样态称为发展型治理,并阐释其理论基础、现实背景、基本特征和潜在困境。结果表明,多维发展观而非发展主义是其理论基础;沿海发达村庄面临的快速、赶超型的区域发展背景是其现实基础;治理与发展的选择性亲和,兼顾知识、关系和行动的企业家型领导,亏钱式管理的治理策略,跑步前进式的资源获取方式是其基本特征。然而,发展型治理也面临着诸如阶层怨恨的累积、过度经营和公共性消解等潜在困境,建议塑造一个专业的职业村干部群体、构建“三位一体”协商性机制及理顺阶层流动和沟通的渠道。

关键词:发展;村庄治理;企业家型;东部沿海村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7)12-0294-05

1 理论阐释:发展与发展主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便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以经济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现代化”及“要发展就必须实现经济现代化”等关于发展的词汇不断出现在政策文件、相关网站及媒体报道中。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日趋繁荣,实现了快速和超越式的发

展。然而,我国社会在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将发展单一化等同于经济增长,忽视了发展具有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等非经济特性。当发展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畅行于第三世界的时候,发展主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决策。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摆脱欠发达态势的急切需求及现代西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不断的蔓延、涓滴和渗透,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为主要价值预设前提的发展主义思潮逐渐主导了我国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即其背后隐含着唯经济增长为上的主义思潮,这集中表现为唯发展为主要目标,超速、快速地发展;农村社区需要进行城市化改建,没有发展就没有现代化;GDP 成为衡量地方经济发展和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等。发展被践行为单

收稿日期:2016-12-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编号:16YJC840026);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编号:2016B3579)。

作者简介:任超(1985—),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主要从事农村文化治理研究。E-mail:13796619737@163.com。

到的政策问题[J]. 城市规划,1999(9):18-20.

[3] 吕宏芬,王积瑾. 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的成因及对策研究[J]. 农村经济,2005(4):104-105.

[4] 王涛. 西安市城中村改造模式及对策探讨[J]. 人文地理,2008(4):46-50.

[5] 洪增林. 城中村改造模式及效益研究——以西安市城中村改造为例[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2(3):431-436.

[6] 陈清璠. 城中村改造开发模式对比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2012(3):60-63.

[7] 汪晖. 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征用:征用权与征地补偿[J]. 中国农村经济,2002(2):40-46.

[8] 刘源超,潘素昆. 社会资本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影响分析[J]. 经济经纬,2007(5):118-121.

[9] 全德,冯长春,邓金杰. 城中村空间形态的演化特征及原因——以深圳特区为例[J]. 地理研究,2011,30(3):437-446.

[10] 丁传标,张涵,程明洋,等. 城中村空间形态对居民居住安全感的影响——以广州珠村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4):68-73.

[11] Niemelä J. Is there a need for a theory of urban ecology? [J].

Urban Ecosystems,1999,3(1):57-65.

[12] Berg T D. Reshaping Gotham: the city livable Movement and the re-development of New York City,1961——1998[D]. Indiana, U S A:Purdue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1998.

[13] Evans P. Livable cities? Urban struggles for livelihood and sustainability[M].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14] 李丽萍,郭宝华. 关于宜居城市的理论探讨[J]. 城市发展研究,2006,13(2):76-80.

[15] 张文忠. 宜居城市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 城市规划学刊,2007(3):30-34.

[16] 任学慧,林霞,张海静,等. 大连城市居住适宜性的空间评价[J]. 地理研究,2008,27(3):683-692.

[17] 闵雷,熊贝妮. 宜居型社区规划策略研究——以武汉低碳生态社区规划为例[J]. 规划师,2012(6):18-23.

[18] 郑童,吕斌,张纯. 基于模糊评价法的宜居社区评价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11,18(9):118-124.

[19] 李雪铭,刘秀洋,冀保程. 大连城市社区宜居性分异特征[J]. 地理科学进展,2008,27(4):75-81.

[20] 程钢,张富杰,杨杰,等. GIS 支持下的城市小区的居住适宜性分析研究[J]. 测绘通报,2016(1):49-52,61.